



黑衣修士

契 诃 夫 小 说 选

李鹤龄 杨 楠 译
杨衍松 尹曙初

花 城 出 版 社

黑衣修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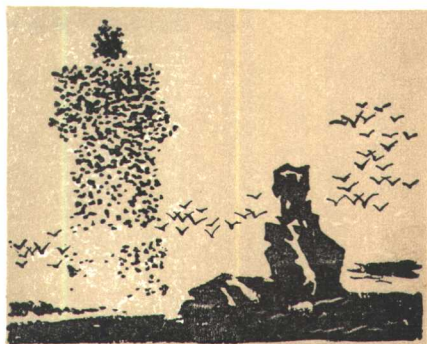
契诃夫小说选

李鹤龄
杨衍松

杨楠
尹曙初

译

PA
R813.2
24538



花城出版社

24538

黑 衣 修 士

(契诃夫小说选)

李鹤龄 杨楠
杨衍松 尹曙初 译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125印张 1插页 220,000字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500册

书号 10261·234 定价 1.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进俄罗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三篇中篇小说和十篇短篇小说。在中篇小说《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讲的故事》中，契诃夫以他特有的尖刻、辛辣的笔触，描写一个从小饱受后娘虐待和婚后受尽丈夫欺凌的妇女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为追求自由生活而私奔，及其后来受到彼得堡官员奥尔洛夫玩弄、凌辱的悲惨遭遇，深刻揭露十九世纪俄国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化。中篇小说《黑衣修士》，是契诃夫的一篇有深远影响的杰作，它描写一个满脑子自大狂和因过度工作损害了自己神经的哲学教师科弗林思想和爱情生活。小说以他多次在迷惘中见到一千年前出没在叙利亚和阿拉伯沙漠的修士幻影来展开故事矛盾，形象地刻画了这类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中篇小说《一件不愉快的事》，语言幽默，讽刺了沙俄时代用人的裙带关系和腐败制度。其他小说题材广泛，人物风姿各异，心理描写细腻。

目 录

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讲的故事	1
美女	104
公爵夫人	115
在庄园里	132
带小狗的太太	144
黑衣修士	168
古谢夫	212
太太	231
例行公事	240
邻居	262
一件不愉快的事	288
马车上	313
主教	325

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讲的故事

由于种种现在还不便细说的原因，我必须到彼得堡的一位官员家里去当仆人。他姓奥尔洛夫，约摸三十五岁，名叫格奥尔基·伊万内奇。

我之所以到这位奥尔洛夫家去当仆人，是由于他父亲的缘故。他的父亲是位国家要人，我素来把他看作是我的事业的大敌。我的打算是：住在其子家里，就能从我听到的谈话里，从我能在书案上翻到的文件和信札中，详细弄清其父的计划和意图。

通常是在上午十一时左右，我的下房里就响起了电铃声，通知我主人已经醒了，于是我就拿着刷干净了的衣裳和擦好了的靴子走进卧室。格奥尔基·伊万内奇呆呆地坐在床上，那神情不象是睡意未足，倒象是睡过了头，眼望着一个地方，并不因为睡醒过来而感到满意。我帮他穿衣，他呢，随我摆弄，显出不乐意的神气，一声不吭，根本没有感到我就

在他的身旁。然后他去洗漱，带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和一身新洒上的香水到餐室去喝咖啡。他坐在桌旁，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翻阅报纸，而我和使女波丽娅恭恭敬敬地站在门旁，望着他。两个成年人精神特别集中地注视着第三者喝咖啡，吃点心，这种事看来是十分可笑、十分别扭的吧！不过，虽然我同奥尔洛夫一样出身名门，受过同样教育，但是我却不因为站在门旁而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那时，我正开始害肺病，此外还害着别的可能比肺病还要重的病。我不知道，是因为疾病的影响，还是我当时还觉察不到的人生观起了变化，我一天天地热烈渴望能过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希望心灵上能得到平静，身体健康，呼吸新鲜空气，得到温饱。我渐渐变成了一个幻想家。正象幻想家一样，我不知道究竟需要什么：时而想去当修士，整天整天地坐在修道院的小窗口眺望树林和田野；时而想买下五十俄亩的土地去过地主生活；时而暗下决心要去从事科学研究，一定能成为某所内地大学的教授。我本是我国海军的一名退伍中尉，常梦见大海，梦见我们的舰队和我周游四方的那条炮舰。想当初，我在热带丛林中漫步，或在孟加拉湾观赏日落的时候，我常感到心旷神怡，同时又思念故乡，现在我又想体验那种不可言喻的感情。我梦见山峦、女性和音乐，象孩子一样好奇地细看人们的面容，细听人们的语声。因而每逢我站在门旁望着奥尔洛夫喝咖啡的时候，我不觉得自己是个仆人，而是一个对世间万物，甚至对奥尔洛夫都感兴趣的常人。

奥尔洛夫有一副典型的彼得堡人的外表：窄窄的肩膀，长长的腰身，陷下去的双鬓，眼睛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头发、胡子全都稀疏，毫无光泽。他的脸虽然保养得好，但显得疲倦、难看。每逢他在沉思或者睡觉的时候，这张脸尤其难看。普普通通的外表是犯不上去描写的，况且彼得堡并非西班牙，男人的外表即使是在风流的情场里也没有多大意义，只不过为漂亮的仆人和车夫所需要罢了。我之所以讲起奥尔洛夫的脸和头发，仅仅是因为在他的外表上还总算有点东西值得一提，这就是每逢奥尔洛夫拿起一份报纸、一本书（不管是什么报纸、什么书），或者他见到别人（不管是什么人），他那双眼睛便立即讥讽地笑起来，于是整个脸庞便有着一副冷嘲热讽的表情。每当他在阅读书报或者听别人讲话之前，这种讥讽表情就已准备好了，如同野蛮人准备好他的盾牌一样。这是一种年深日久养成习惯的讥讽表情，而到如今，用不着他费多大的劲，这表情好象条件反射般出现在他的脸上，不过这一点以后再谈吧。

十二点以后，他就抓起他那塞满公文的皮包坐车去办公。他不在家里用中餐，八点钟以后才回到家来。我把书房里的灯和蜡烛点亮以后，他就在圈椅上坐下来，把双腿伸到靠椅上，就这么半躺着看起书来。几乎每天他都带回一些新书，或者书店派人送书上门，这样一来，有很多的书，除俄文书外，还有三种文字的书，经他读过就丢掉了，便都摆在我的下房的四角和我的床下。他看书看得十分快。俗话说：“只要你告诉我读什么书，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人。”这话也许不

假。但是要根据奥尔洛夫读的书来推断他的为人是绝对不可能的。那是一堆大杂烩：有哲学，有法国小说，有政治经济学，有财政学，有新诗人的新诗篇，还有《中间人出版社》^①出版的小册子，——这些书他全都看得一样快，也一样带着讥讽的眼神。

过了十点钟他就细心地打扮好，往往穿上燕尾服，很少穿他那身少年侍从的官服，坐车出门，拂晓时才回到家来。

我同他相处安静和睦，从来没有发生误会。通常他不觉得有我这个人在他的住所里，即使他跟我谈话时，他的脸上也没有那种讥讽表情，显而易见，他根本没把我当成一个人。

只有一次我看见他生气了。那是在我来他家当仆人的一个星期以后的一天。那天九时左右，他赴宴归来，脸色阴沉、疲倦。当我跟在他的后面走进书房去点蜡烛的时候，他对我说道：

“我们家的房间里有一股气味。”

“没有，空气很新鲜。”我答道。

“我说有气味嘛！”他暴躁地又说了一遍。

“我每天都打开小窗来着。”

“不许强嘴，笨蛋！”他吼了一声。

我受了委屈，刚要顶撞，若不是比我更加了解主人的波

^① 《中间人出版社》，弗拉基米尔·格里哥里也维奇·切尔特科夫(1854—1936)创办，他是《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的编者，列·尼·托尔斯泰的好友。

丽娅上来插话，那么，天晓得这件事会弄到什么结局。

“这儿真的有股难闻的气味哩！”她双眉一挑，说道。“这是打哪儿来的呢？斯捷潘，去把客厅里的小窗打开，在壁炉生起火来。”

她忙碌起来，哎呀地连声叹着，吱吱地打着喷雾器，把裙子弄得瑟瑟地响，走遍所有房间，而奥尔洛夫还在生着闷气。看来，他是在克制自己不发脾气，坐在书案旁飞快地写信。写了几行字，他生气地哼了一声，把信撕了，然后又重新写起来。

“让他们见鬼去吧！”他嘟嘟哝哝地说道。“想要我事事都记住！”

最后，信写好了，他从书案旁站起来，对我说道：

“你到兹纳缅斯卡娅大街去，把这封信交给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克拉斯诺夫斯卡娅本人。不过先要问一下门房，她的丈夫，也就是克拉斯诺夫斯基先生，回来没有。要是回来了，就别交信，立即回来。等一等！要是她问你我家里有客人没有，你就说从八点钟起我这里有两位先生在写公文。”

我坐车到兹纳缅斯卡娅大街去了。门房告诉我，克拉斯诺夫斯基先生尚未回府，于是我就走上三楼。给我开门的是一个又高又大的仆人，他的皮肤是棕色的，一脸黑色的络腮胡子。他问我有什么事，那口气是懒洋洋的，爱理不理的，粗声粗气的，只有仆人对仆人才这么谈话。我还未答话，一位穿着黑色连衣裙的太太从房里匆匆走进前厅。她眯起眼睛望着我。

“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在家吗？”我问道。

“我就是。”太太说道。

“格奥尔基·伊万内奇叫我送来一封信。”

她连忙把信拆开，双手捧着，露出手上带的钻石戒指，读起信来。我细细地打量这张白皙的脸，线条纤细，下巴翘起，睫毛又长又黑。从外表上看，我捉摸这位太太最多不过二十五岁。

“请代我问候格奥尔基·伊万内奇，并致谢意。”她看完信后说道。“他家有客人吗？”她柔声而又快活地问道，仿佛因为自己起了疑心而有点难为情似的。

“有两位先生。”我答道。“他们在写什么东西。”

“请代我问候并致谢意。”她又说了一遍，然后偏着头一边走一边看信，轻飘飘地步出前厅。

那时节我很少见到女性，因而这一位瞬间见到的太太给我的印象很深。在步行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她那张脸和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香气，于是又幻想起来。等我回到家来，奥尔洛夫已经不在。

二

总之，我同主人相处是安静、和睦的，不过，我来当仆人时曾经担心的那种使人感到屈辱的肮脏东西终究还是存在着，并且每天都使我感觉到。我跟波丽娅合不来，这是一个又肥又胖、娇气十足的风骚女人。她对奥尔洛夫俯首听命是

因为他是老爷，对我轻蔑鄙视是因为我是仆人。也许，从名副其实的仆人或者厨子的眼光来看，她是迷人的：红红的脸蛋，翘起的鼻子，眯成一线的眼睛，已经变成肥胖的丰满的身躯。她擦脂抹粉，描眉毛涂口红，穿一件紧身衣，臀部塞着软垫，腕上戴一只假镯子，走起路来步子又细又快，与其说是在走路，还不如说是在摇摆，就象俗话所说的那样摇肩膀，扭屁股。当我每天清晨同她一起打扫房间的时候，她那裙子的瑟瑟声，紧身衣的轧轧声和假镯子的丁当声，还有那一身从主人那儿偷来的唇膏、香醋和香水的怪气味，总在我的心头挑起这么一种感觉：好象我和她正在干着一桩丑事似的。

是因为我没有同她一起偷东摸西呢，还是因为我无意做她的情人，使她感到侮辱，也许，还因为她嗅到我同她不是一流人，因此，从第一天起，她就恨上我了。我不会做事，容貌也不象个仆人，又害着病，这在她看来既可鄙又可怜，惹得她满心厌恶。那时候我咳嗽厉害，夜间常常使她睡不好觉，因为我和她的房间只隔一道板壁。每天早晨她总是对我说：

“你又使我没睡好觉。你最好是去住医院，而不是来老爷家里做工。”

她从内心里就认为我算不上一个人，而是比她要低得多的东西，因而就象当着奴隶们的面洗澡，一点也不感到害臊的罗马贵妇人那样，有时居然当着我的面只穿一件汗衫。

有一天在吃中饭时（我们每天都是从饭馆取来菜汤和热

饭菜用餐的)，我的心情舒畅，遐想联翩，于是我就问她：

“波丽娅，您信仰上帝吗？”

“当然信啦！”

“这么说来，”我接着说，“您相信会有严厉的审判，而我們为自己干的每一桩坏事要对上帝作出回答罗？”

她没答话，只是做了一个满不在乎的鬼脸。这一次我望着她那心满意足而又冷漠无情的眼神，懂得了在这个习性已经完全定型的人的心目中，既没有上帝，也没有良心，更没有法律。要是我去杀人、放火，或者行窃的话，那么，即使花钱也别想找到比她更好的同伙了。

我刚来奥尔洛夫家的第一个星期，由于环境改变，加上不习惯别人称我为“你”，也不习惯经常说谎（老爷在家却偏要说不在家），所以生活过得很不轻松。穿着仆人服装我觉得象是披铠戴甲似的。但后来习惯了，就象真正的仆人那样侍候主人，打扫房间，为完成主人的各种使命四处奔走。每当奥尔洛夫不愿去赴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的约会，或者忘了自己答应过要到她家去的时候，我就坐车去兹纳缅斯卡娅大街，当面交给她一封信，说一次谎。这就与我来当仆人的本意完全不相干了。我过的这种新生活的每一天光阴，对于我本人和我的事业来说，都白白地给浪费掉了，因为奥尔洛夫从未谈起过他的父亲，他的客人也是如此，于是对于这位国家名人的活动的了解，仍象从前那样，只能从报纸上和与同伴们的通信中才能获得。我在书房里翻阅到的几百张信纸和公文，同我所要寻求的东西，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奥尔洛

夫对于他的父亲显赫的国务活动丝毫不感兴趣，看他那副样子就好象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父亲有些什么活动，又好象他的父亲早就死了。

三

每逢星期四我们都有客人来。

我在餐厅订购一块牛排，打电话给叶里塞也夫，请他给我们送来鱼子、干酪、牡蛎和其他吃食，买好扑克牌。波丽娅从一早就准备茶具和晚饭用的餐具。老实说，这一小小的活动给我们闲散无聊的生活倒增添了一点儿乐趣，因而星期四对于我们来说是最有意思的日子了。

常来的客人只有三位。最有气派的、恐怕也是最有风趣的是一位姓彼卡尔斯基的客人。他长得又高又瘦，约摸四十五岁，有一只长长的鹰钩鼻，一大把黑胡须，头顶光秃，一双大大的金鱼眼，脸部表情严肃、深沉，俨如一位希腊哲学家。他在铁路管理局供职，又在一家银行里兼差，还是某一个重要的国家机关的法律顾问，此外，还以代办人和债权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同许许多多的私人打交道，等等。他的官阶实际上并不高，谦逊地自称律师，可他的势力却大得很。只要您拿着他的一张名片或者一纸便条，就可以使一位名医、铁路局长或者一位要员破格接见。据说，以他做靠山，甚至可以谋到四品官的职位，任凭什么不愉快的事都可了结。人们把他看作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不过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

奇特的聪明。他可以在一瞬间心算出 213×373 等于多少，或者不用借助纸笔把英镑折合成马克，精通铁路业务和财政，官场中的一切对于他来说并不算秘密，在民事诉讼方面称得上是个最老练的律师，跟他打官司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位与众不同的聪明人却不懂许多事情，而这些事情就连蠢人都知道。例如，他压根儿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苦闷，会伤心，会自杀，甚至会去杀人，为什么会为那些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事物和事件着急，为什么在读果戈里或者谢德林的作品时会发笑……一切隐藏在思想感情领域里的抽象东西，对他来说都是不可理解、枯燥乏味的，如同音乐对于一个没有音乐感的人一样。他只是从办事的观点出发来看待人们，把他们分成能干的和不能干的两大类，此外不存在任何分类法。诚实和正派只是能力的一种标志。聚众痛饮，赌钱打牌，寻花问柳也未尝不可，但要有个尺度，就是不要妨碍正事。信仰上帝是不明智的，可是宗教应当得到维护，因为对于百姓来说总得要有一种有约束力的教义，否则他们就不会做工了。惩罚是需要的，但也仅仅是为了以儆效尤。到城外去住别墅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城里也挺好嘛，如此等等。他是个鳏夫，没儿没女，但却过着阔绰的家庭生活，每年要付三千卢布的房租。

另一位客人库库什金，年纪虽然轻，却做了正四品文官。他的个儿不高，仪表极为难看，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那又肥又胖的身躯同他那张又瘦又小的脸很不相称。嘴唇撮成桃心形，修整的上髭看起来好象是用油漆粘上去似的。这

个人的行动举止活象一只壁虎，他不是走进门来，而是迈着细碎的步骤溜进门来，同时筛动着身子，发出嘻嘻的笑声，而且在发笑时总要把牙齿齧出来。他是某大员属下的一名负有特别任务的文官，虽然领取一笔很大的薪俸，但却什么事都不做，特别是到了夏天，总要为自己找各种各样的美差外出走走。这是个官瘾很重的人，那种瘾不仅深入到了他的骨髓，而且还要深一些，渗进了他的每一滴血。不过，他是个渺小的向上爬的人，他不相信自己有本事，却只靠送礼行贿来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为了得到一枚外国的十字勋章，或者为了能在报纸上报道他同别的高级官员一起参加了追悼会或者祷告仪式，任什么低三下四的勾当他都肯干；苦苦哀求呀，阿谀逢迎呀，许愿呀……出于畏惧的心理，他拍奥尔洛夫和彼卡尔斯基的马屁，因为他认为他们是有权有势的人物；也拍波丽娅和我的马屁，因为我们在一位有势力的人物家里当差。每当我脱下他身上的皮大衣的时候，他总是笑嘻嘻地问我：“斯捷潘，你娶媳妇没有啊？”紧接着便说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这是对我特别关心的表示。库库什金迎合奥尔洛夫的弱点，恭维他那败坏了的道德和他的享乐生活。为了取悦于奥尔洛夫，他假意说些恶毒的讥讽话和不敬上帝的话，同奥尔洛夫一起笑骂别人，要是换个地方，他在这些人的面前倒俯首帖耳得很哩。要是在晚宴席间谈起女人和爱情的话，他也能装做一个精于此道、风流多情的色鬼。应当指出的是，彼得堡的风流浪子们一般都喜欢谈谈他们的怪癖。别的年轻的四品文官对于自家厨娘的温存，或者能得到在涅

瓦大街之上游荡的不幸的妓女的拥抱，就已感到心满意足了。可是，听听这位库库什金的谈话，就觉得东方和西方的一切淫荡丑行他全都沾染上了。他是十来个伤风败俗的秘密团体的名誉会员，已经受到警察当局的注意呢。库库什金对自己信口雌黄，厚颜无耻，而他们对他讲的那些奇闻轶事不是不相信，而是听了不大留心罢了。

第三位客人格鲁津，是一位有声望、有学问的官员之子，跟奥尔洛夫同年，有一头长长的金发，一双近视的碧眼，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我还记得起他那象钢琴家一样的又长又白的手指头。确实他全身都有着一种技艺高超的音乐家的派头，乐队里的第一提琴手就是这个模样。他总是咳嗽，害偏头痛病，面容憔悴、虚弱，大概在家里他跟小孩一样是由别人给他穿衣脱衣吧。他毕业于法律学校，先在司法部门做事，后来调到元老院，辞了职，经人保荐在国产部谋到一个位子，不久又辞职不干。在我当仆人的那段时间里，他在奥尔洛夫手下做事，是他的一名科长，不过他经常扬言不久又要调到司法部门去。他十分轻率地对待工作，因而不当一回事地从这儿调到那儿。但是，有人当着他的面谈到官阶、勋章、薪水时，他又一本正经地笑着，重复一句普鲁特科夫^①的格言：“只有在国家部门当差，你才能认识到真理！”他有一

^① 科兹马·普鲁特科夫，是俄国作家阿·康·托尔斯泰和热姆楚日尼科夫兄弟的集体笔名，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他们用这一笔名发表了诗歌、寓言、讽刺作品和格言汇编《深思的成果》，许多格言已成为谚语。